“消费”概念的嬗变与“消费社会”的构建机制*

夏　　莹

提　要 | 以社会经济发展结构的演变为背景,文章考察了消费的概念以及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价值的演变过程,指出了消费所具有的两个基本内涵:“消耗”与“交流体系”,阐明了作为消耗的消费对社会发展而言如何由否定性价值转变为肯定性价值的过程,而具有社会区分作用的交流体系的消费概念正是消费社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 | 消费　消耗　交流体系　积累

中图分类号 | C913.3

作者信息 | 女,1973年生,博士,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300071。

一

消费社会的兴起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作为一个概念,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信息社会”、“富裕社会”、“新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种种新名词的出现而诞生。这些不同的称谓所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社会形态。需要指出的是,称谓的不同代表的仅仅是考察和研究的视角的不同。因此,消费社会是以消费为视角和切入点来研究和批判当代社会的一种批判理论。然而,消费作为人的极富个性化的行为,何以能够由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转变为批判、审视当下社会的切入点?消费的内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嬗变?本文将以社会经济发展结构的演变过程为视角来回答以上问题,并通过这一转变的形成过程解读“消费社会”的构建机制。

消费从来都不是一种可以脱离人及其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的纯粹的经济行为,它在本质上是某种社会关系的体现。那么由此不同时期对于消费的不同看法也是由其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在前工业社会以及工业社会初期,当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时候,绝对稀缺制约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如何积累绝对的货币财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因此仅仅将消费视为一种无意义的消耗,并试图完全抑制消费

* 本文为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为05FCZD008;同时本文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为B103)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基金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作者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重商主义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性思潮。

早期的重商主义者们极力维护着本国对货币量的占有,这一观念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将对外贸易看成是财富获取或流失的关键环节。在贸易中,“一切购买都会使货币减少,一切销售都会使货币增加,因此,实现外贸顺差以增加货币的办法就是绝对的少买或不买,以防止货币外流和增加货币积累”。①作为消费行为的购买由于造成了对货币的消耗,从而成为了一种有害的行为。由此导致了“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着他心爱的钱袋,用妒忌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②在这一意义上,早期的重商主义与重金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两者起初可以重合,但随着作为重商主义政策的积极实施者——西班牙国家的败落,这种极端的重金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反思与批判。所有的国家与理论家都开始害怕自己最终会陷入到西班牙曾有的“富于黄金,贫于生产”的贸易逆差的陷阱中。所以早期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孟克列钦就对财富与货币或者黄金的等同关系提出了异议:“一国之富,不在于金银,也不在于珠宝之丰,而在于生活衣着必需品之充斥;一国生活衣着必需品多,该国生活富裕。说老实话,我们所有的金银比我们的祖先多;但是我们的生活并不比他们好些,也不比他们富些。”③孟克列钦在此已经具有了一种新的衡量财富的视角,对生活必需品的强调实质上是对消费的认可,但同时由于仅仅停留在对必需品的强调,所以对消费的这种认可又不得不是有限度的。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与成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全面替代了封建社会,从而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社会逐渐从绝对性稀缺转变为一种相对性稀缺。因此虽然财富问题仍然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但理论不再囿于狭隘的地域性财富积累,而转变成了如何真正促进总的财富量的增长。因此以劳动价值论的提出为标志的生产性转向突显出来,而在这一时期中对消费所进行的研究根本上源自于对经济危机的关注。

例如,西斯蒙第正是因为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相对于严重不足的消费力而产生的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才发展出极具批判性的浪漫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在生产与消费之间需要建立的平衡关系,并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可见在生产、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相互比例中,如果发生不协调现象同样会有害于国家,有时会使生产的收入比平时减少,有时会使一部分资本变成消费基金,或者相反,这种消费减少,也就不再要求新的生产。只要这种均衡受到破坏,国家就会遭难。”④消费在此对生产的影响主要在于阻碍再生产的进行:“绝对的消费决定着相等的或扩大的再生产。再生产的范围是否可以扩大,或是成螺旋形变化就取决于这一点。”⑤因为在西斯蒙第看来,财富的主要表现就在于它可以用于“消费”满足自身的需求:“人类劳动的惟一目的是供应自己的需要,任何东西,只有它的产品必须能供人类或快或慢地消费才有价值,最后,人类只要开始享用财富,或停止财富的流通,就要开始消费财富。”⑥而“财富一旦没有适当用途,就会使同等数量的再生产陷于停顿,得不到再生产的代替”。⑦生产的停滞无疑将带来国家的危机。但在此由于西斯蒙第所指出的这一消费矛盾是建立在以

① 丁冰:《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17页。

② 〔德〕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96页。

③ 转引自丁冰:《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22页。

④ 〔法〕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85页。

⑤ 同上,第83页。

⑥ 同上,第81页。

⑦ 同上。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分配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的，所以不可能真正意识到分配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对于这一根源的系统阐发只有在马克思的“生产”视角下才成为可能。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它的“生产相对过剩”。“相对”，在此所指的是人的购买力与生产力之间的对比关系，在本质上也就是人的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因此经济危机的产生根源在于生产与消费的脱节。当消费远远低于生产发展的时候，就会产生经济危机。

但是按照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消费与生产的这种脱节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它是由于货币的诞生而导致的买与卖相脱节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资本主义以永不停止的扩大再生产为自身的生命，资本的积累就在这种不断扩大的再生产中得以实现。为了解释资本积累的量的衡量，马克思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所谓资本的有机构成，就是指资本技术构成决定而又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的积累与扩大主要集中在对固定资产的建设中，资本的有机构成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断提高。这就意味着可变资本，亦即劳动力的需求量在不断减少，从而形成了相对的人口过剩，亦即为数众多的产业后备军。这一后备军的形成直接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相应的也就必然导致了无产阶级购买力的急剧下降。这就是消费力持续不足的背后原因。

显然，直到马克思时代，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之中，消费仍然仅仅被视为一种“消耗”。但这种消耗对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影响力正在显现出来，只是这种显现是以否定性的形态展现的。

二

自19世纪至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迎来了一个可以用消费来命名的时代。消费作为一种消耗的基本内涵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它作为一种力量对生产所具有的影响已经由反作用转变为主导性作用，消费不仅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在其现实性上，它的增长已经直接成为一种生产。

自工业革命以来，衡量社会发展的基本方法在不断精确化的诉求中走向了量化的最终归宿。一国的国民财富的增长最终都要通过可比较的数字来加以衡量。增长所呈现出来的首先是某组数字的变化，从而形成了博德里拉所讽刺的“计算的幻影”、“集体迷恋的巫术”。①在当代社会中，这一巫术主要附着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

在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三种主要的计算方法中，支出法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计算方法。支付法，或称最终产品法，其计算方法为：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国内资产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库存净增或净减）+ 出口与进口的差额。消费的增长在国民经济的计算中已经转变成为一种正值。它在数量上的增长直接反映出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水平。消费的这一转变使得消费完全成为一种肯定性的因素参与到经济发展的计算之中。这一转变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在其现实性上，一切消耗都直接被转变为一种带有生产性的正值的增长。

不仅消耗本身不再具有任何否定性，而且任何意义上的、任何方式上的消耗都不再具有否定性。只要是对生产出的产品的消耗，或者引发了某种对生产的需求的消耗都对增长具有积极意义，而对经济增长的热切追求反过来也将任何功能障碍性的消费隐蔽在功能性消费之下。作为一种消耗的消费本身的增长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砝码，因此如何刺激消费的增长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对经济的持续发展的要求必然要求

①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消费从对必需品的需求与消耗转变为对所有可能的产品的消费。

作为一种消耗的消费何以成为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国民生产总值为什么要以消费量作为衡量标准？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将视野重新放到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中来。

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指出服务行业的兴起应看成是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后工业社会第一个和最简单的特征，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① 然而作为服务行业的产业模式在其运行中与生产性产业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在于服务业不需要过于庞大的资本积累，特别是固定资产的比例在这个资本中的比例大幅度减少，这与服务业本身的技术性以及智能化的特征有关。换句话说，在服务性行业中，人作为智能的载体将成为决定性因素。因此，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中，劳动力的价值比例应获得相应的提高，这与固定资本的降低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此，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方式产生出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1989年发表的《后现代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一书中称之为灵活性积累(flexible acumulation)："我所将要说明的灵活性积累是与僵直死板的福特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积累方式。它建筑于劳动过程、劳动市场、产品以及消费模式的灵活性基础之上。它是由商业化的、技术的以及组织的革新而带来的变化。它内涵着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地区之间非平衡发展模式的转变，引发了例如大规模的所谓'服务行业'的兴起。"②

对应于服务业的兴起而出现的灵活性积累，在其资本积累过程中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经济运行中由于通信技术的发达，市场信息的发布与反馈的速度大大提高，即时的信息获取方式决定了个人以及公众的决策所消耗的时间大大缩短。由此，小规模的定做型市场(coustom-markets)形成了。信息的多样化与即时性使得人的需求易变与多样，因此"在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即时性以及竞争的环境中迅速地作出转移的决定对于获取利润来说至关重要"。③最终这样一个市场的形成必然导致生产周转时间的加速(acceleration of turnover time)。较小的、多样化的市场需求要求生产规模的缩小与多样化，要适应这一迅速的变化，在固定资本的投入中需要不断提高技术性含量，也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加大劳动力的资本投入。后者作为相对灵活性的因素对于灵活性生产具有直接的作用。(4)最终导致了一种新的失业模式：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劳动者不再被固定在某个行业中的某个位置上，由于生产的灵活性导致了人力资源的灵活性组合，这是应对灵活性生产所必需的一种新的组织方式。

灵活性积累最终导致对社会发展产生两个重要方面的影响：

(1)由于固定资产不断提高而相应减少的劳动力投入在灵活性积累的条件下可能获得缓解，因此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所必然导致的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倾向也相应地得到缓解。这意味着劳动者的购买力在社会财富的增长中也将获得提高，生产与消费的断裂程度在一定范围内得以缓解。

(2) 周转时间的加速需要以消费的周转时间减少为前提。小规模、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得以生存必须以多样化的、快速的消费为前提。需要消费迅速地将生产出的产品消耗掉，并产生新的需求，同时因为灵活性积累中

①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 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0页。

②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Blackwell Publishers, UK: Cambridge MA&Oxford, 1990, p. 147.

③ 同上，p. 158。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所导致的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增大，使得劳动者面对新的需求时有了相当的购买力，从而使这一需求所引发的消费得以实现，因此，灵活性生产才可能持续地发展下去。所以，今天“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其可能的使用时间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根据其死亡时间。死亡的加速势必引起价格上涨速度的加快”。①

正是灵活性积累的内在要求导致了作为消耗性的消费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肯定性力量。与之相应，消费的内涵也悄悄地发生了一种转变。正是这一转变最终催生出了一个以消费来驯化人的消费社会。

三

在哈维的灵活性积累中，消费不仅具有一种能动的生产性，同时，消费的对象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正是这一变化为我们理解消费内涵的转变提供了契机：“消费的周转时间的加速已导致了强调重点的转移，由对物的生产（如具有物质性的存在状态的刀叉等的物）转向了对事件的生产（例如景观，它可以具有即时的周转时间）”。②

哈维在此所指出的消费对象的转变实际上已经触及了消费这一概念本身发生的变化。消费不再是指向具体的、实体性的物的消费，而变成了对即时性的事件的消费，对一种景观（spectacles）的消费。这一景观作为一种呈现方式，完全可以抛弃被消费物的实体性的存在，完全可以被抽象为一种意义，因此消费越来越由现实的、物质性的满足转向了一种心理性的满足。消费的对象完全可以变成某种象征物，象征出某种幸福，然后期望着这种幸福，并在消费的过程中体验着这种幸福的象征。由此，意义以及象征着这种意义的符号将最终成为消费对象的实质性内涵。

对符号的消费完全是即时性的，因此对应于当代社会的灵活性积累成为社会消费的主要方式。同时对符号的消费也使消费者与意义所赖以存在的现实拉开了距离。它用来刺激与满足消费者的方式在于将一切现实符号化。政治的、历史的或者文化的等等事件都可以用符号的方式使其具有消费性。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当消费的对象脱离了实体性的物质形态，并被符号化了，那么任何东西都可能进入消费领域。我们生活中原本自然的、不具有商品性的东西都可能因为具有某种意义性价值而成为需求对象，如新鲜的空气、水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由于没有交换价值而不能成为商品的东西在意义消费的视野下由于具有的符号价值而成为可以交换同时也可以消费的对象，但这种意义性的消费并不像物质性的消费一样是一种对对象的消耗，在其现实性上，意义性的或者说符号的消费所产生的效果是社会区分。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社会的差异或者不平等只可能产生于交换（重商主义者的主张）或者生产（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的过程中，消费由于面对着实体性物品的使用价值，而具有了一种平等性。在使用中，相同的物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但当符号价值附加到了物之上时，这种平等就仅仅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因为意义的灵活性使得每件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物本身都会有完全不同的符号价值。这一不同的意义在单个物之中是无法体现出来的，正如符号化的意义消费在单个人那里只是代表了一种消费对象的变化，“惟有意义的是当它们汇聚在一起的时候的形状、与这些物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整个社会‘前景’。那里总有一个区分性的意义。”③换句话说，只有当意义性的消费处于一种比较的体系之中，这一消费内涵才可能获得真正的

① 〔法〕让·波德里亚，2000年，第29页。

② David Harvey, 1990, p. 157.

③ 〔法〕让·波德里亚，2000年，第46页。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达。

在此意义上的消费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1)作为建立在一个密码(符码)基础之上的明确意义和交流过程,实际消费行为能够在其中得以实现并具有应用的意义。在这里,消费是一种交流体系,而且是一种语言的同等物。(2)作为社会分类和区分过程。物和符号在这里不仅作为对不同意义的区分,按顺序排列于密码(符码)之中,而且作为法定的价值排列于社会等级。这里,消费可能是战略分析的对象,在法定的价值(涉及到其他社会含义:知识、权力、文化等)分配中,决定着其特殊的分量。”①

因此,消费成为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密码(符码)基础之上的一种交流体系。形成体系的前提在于多种意义的聚合,并在聚合中组成某种特定的结构。而消费如同一种语言,说出了这多种意义聚合的结构,即消费说出了社会分类和区分。通过对物的意义的消费,符号化的物所形成的社会符码以及由此符码所形成的社会等级才得以彰显出来。

从这一意义上说,消费经过了物的体系化(形成一个连续的序列)、符号化(意义化)、符码化(形成社会特定的编码)之后转变成为表征这一符号编码体系的交流体系。这一转变的前提就在于一个“丰盛”社会的诞生。虽然这一丰盛社会并非是真的达到了物质财富的绝对富裕,在某种意义上它的丰富性“不是建立在财富之中,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流之中。”② 交流的无限性使得被交换的物的价值不断增加。因此物在一个丰盛社会中的丰富性并不体现为物的大量过剩或堆积,恰恰相反,所有的物都不是多余的,因为它们在当代社会中常常不是作为单个物为消费者所消费,而是作为一个系列而为消费者所认同。物的交流变成了物的体系的整体交流,因此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殊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厨房、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个链条。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③

因此,消费者的消费在对物的使用中表征出物所有的符号化内涵,并将这一意义放置于物的体系所编制的编码之中,以确定消费者在其中的地位。由于编码体系只有在消费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实现,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消费本身就变成了一种社会编码。它以消费什么与怎样消费的问题来言说社会的区分与差异。

但需要指出的是,以消费及其编码所设定的差异并非是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真实的差异。“使之成为系统的,恰恰是它取消了(必然不同的)每个人本来的内容、本来的存在,取而代之以可作为区分符号进行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差异形式”。④换句话说,这一符号的差异只不过是构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差异,因此由它所造成的阶层的划分并不能形成一个固定的集体,并持久的具有共同的利益。因为阶层之间的跨越可以在不同的消费过程中轻松地完成,而它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种经济上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付出,即可以通过付出较多的钱就可以换取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在编码层次上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或者说,革命每天都在发生,那就是‘模式的革命’,它们是非暴力的而且不影响其他”。⑤换句话说,作为一种交流体系的消费彻底地消解了革命。

在此意义上的消费概念不再与物的使用

① 〔法〕让·波德里亚,2000年,第48页。
② 同上,第56页。
③ 同上,第4页。
④ 同上,第88页。
⑤ 同上,第90页。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价值相关，消费的过程也不再仅仅是一种需求的满足，由此从根本上摒弃了传统消费概念的个体性、主观性。因为“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为了（这种‘孤立’只是消费者的幻觉，而这一幻觉受到所有关于消费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精心维护），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消费者都不由自主地相互牵连”。① 所以，作为一种交流体系的消费是一个以某种集体的行为取向为前提的功能性概念。概括地说，消费成为“沟通和交换的系统，是被持续发送、接受并重新创造的符号编码，是一种语言”。② 通过这一语言，人们可以获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社会结构以及约束机制。在此，消费终于变成了一种社会驯化模式。它的基本运行机制就是通过编制某种社会符码，并通过消费的过程将不同的人规约入这些符码之中来完成社会的一体化功能。因此，当我们将消费作为一种分析视角或者方法，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从消费所具有的一体化功能入手推出其中所内涵的社会不平等与差异。因此，在消费社会的视阈下，当消费的内涵由消耗转变为一种交流体系的时候，消费真正变成了整个社会的新的意识形态。它以表面的平等与民主制造着并同时掩盖了内在的社会不公。

在此，我们虽然给出了消费的两个定义，但这两个定义并不是毫无关联地相互独立存在。从现实性上来看，作为消耗的消费永远是消费的基本内涵。而作为一种交流体系的消费是在消耗的对象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时（即由原有的实体性转变为即时的符号性）衍生出来的，然而这种衍生却是当下的社会关系以及当下新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因此，消费才可能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最终担当起了一种批判社会的视角，从而孕育出了一个消费社会。

（责任编辑：杨　丹）

《加拿大社区精神健康杂志》

《加拿大社区精神健康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每年出版两期，是以英语和法语出版的双语刊物。该刊致力于研究与加拿大人的精神健康以及他们生活的社区相关的现象，并传播相关知识与信息。

刊物网址：http://metapress.com/content/120150/

ISSN：0713-3936

（莲）

① 〔法〕让·波德里亚，2000年，第70页。

② 同上，第88页。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